

清儒整理唐代文獻研究

Qingru Zhengli Tangdai
Wenxian Yanjiu

王雪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儒整理唐代文獻研究

Qingru Zhengli Tangdai
Wenxian Yanjiu

王雪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研究 / 王雪玲著. —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161 - 1563 - 3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古籍整理—研究—唐代
IV. ①G2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7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14 千字
定 价 5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贾二强

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学术本身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因而始终是治学者极为关注的领域。20世纪初以来，学者们借鉴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近年这一方面的研究则更趋于精细。鉴于唐代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的地位及影响，唐史研究久为学人所关注，20世纪前半叶以来大家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需要熟悉研究状况，这一点作为治学的入门标准今已为人熟知。21世纪初，国内外唐史学界众多学者联手推出《二十世纪唐研究》，对上一个百年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做了较为系统的汇集、梳理和总结。学术研究必有其传统和继承，绝无可能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百年之前有清一代学者奠立的基础，似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除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所谓“考史三家”及徐松的考史补史所得之外，其他则少有关注。试举一例：当年师从先师黄永年先生求学时，一位师兄发表了一篇考证唐代支度使不同于度支使的文章，先生即指出其实这一问题清人早已注意，只是今人不甚了然罢了。不可否认，当今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种文献数据库的建立，电脑网络检索确实为今人了解前人成果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这一手段尚无从替代认真深入的学术史研究。

2003年王雪玲君随我读博士学位，因她硕士学位论文为阮元学术成就的考察，且素有志于清代学术，因此很快与她商定博士论文选题范围为清人的唐史贡献。清代为汉学昌明光大时期，乾嘉考据学无疑是其时学术的最高境界。如众所知，清代之前的文献之学以传世文献古籍为主体，辅以金石，而甲骨、简册、出土文书、官私档案等则远至清季方才面世为人所知所重。考据学根基于传统文献，二者密不可分，因此清儒的考证学问

实则庶几同于文献之学。清人提出学问为义理、考证、辞章三位一体，近人钱穆以现代学科分类将之对应为哲学、历史、文学，这一比附是否恰当另当别论，然而史学之谨严求实与考据学的宗旨一脉相通。出于以上缘由，加之学科专业本即为文献学，雪玲君学位论文题目几经调整，最终确定为《清儒整理唐代文献考述——兼论清代的唐史研究及成就》。

文献学本身包罗即广博，而学术史研究又头绪纷繁，措手相当不易，由此决定了这一题目具有相当的难度和很大的挑战性。考虑到雪玲属在职学习，工作较忙，当时还有繁重的家务负担，我向她提出，不必求大求全面俱到，需要有问题意识，务必要在前人较少涉及或研究不够的若干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和新的认识。照此思路，其学位论文近于专题研究性质。2007年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答辩委员会很高评价，亦有论文评审人认为是近年来相关领域难得一见的优秀论文。五年来雪玲君遵照专家的建议及修改意见，在原有基础上认真淬炼，精心磨砺，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平心而论，在原作基础上确实有了显著提升和完善。

我以为，此著不仅属于这一选题的开创之作，且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对唐代的关注，大体未出文献整理考治的范式，诚如作者所言，“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清儒用考据家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盛世唐朝的历史，将目光定格在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对唐代文献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与研究”。因此使用文献学的基本思路及方法，可见作者之学术眼界，无疑是一个十分适宜而合理的选择。

今之文献学依现行学科门类，分为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然则诚如黄永年先生及诸多时贤所论，这一划分其实是人为的，并没有多少道理，文献学原本既无必要也根本无从区分文与史。循此判断，作者的研究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展开。从体例内容上清人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钜制《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得到了突出关注；而如清代史家付出极大心血的两《唐书》的勘校、疏理，金石学的复兴及成就，文士所乐道的有唐一代诗文总汇《全唐诗》、《全唐文》及多种唐人别集的编辑笺注也得到了应有的缕析；至于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究治唐史成就最大者徐松，则立为个案辟为专章深入陈论。这种在文献学视野下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得以比较全面地展示出清人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

如前所述，清儒对于唐代的关注究治，一般集中在文献领域内，而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仍须依循前人的考据路径。作者相当纯熟地掌握了这一手段，从《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唐代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徐松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五个主体部分，尤其是对钱、王、赵所谓“考史三家”考治两《唐书》异同及得失短长、金石证史与唐史考补、唐人别集的整理与笺注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章节的审视辨析，无不突出地显现出这种缜密精细强调实证的研究特点。

由于学科的属性，文献之学本身就是材料征实的学问。在相关材料的搜集梳理上，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下足了功夫，虽然尚难以断言相关材料庶几穷尽，但就论题而言可称已然相当翔实。

基于相当充盈的文献依据，加之客观谨严的治学态度，认真求实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其结论可圈可点，除见于各章节就具体内容的评判外，在“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特点与局限”一章复予以系统总结，其立论坚实，诸多论点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读者阅而可知，自毋庸赘言。

雪玲君禀性沉静，潜心治学，不近功利，不媚时俗，以十年磨一剑的态度究治此题目，在时下实为难得，是书的出版应是一份较为完满的答卷。以其对待学术锲而不舍的精神，我深信她必有新的成果不断问世。

是为序。

2012年8月

前 言

在文献学发展史上，汉、唐、宋、清是四个重要阶段，其中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时代，也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明显的总结特征，文献学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清代文献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孙钦善总结清及近代文献学的发展概况时说：“综观本时期的古文献学，集前代之大成，在整个学术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其特点是以古代语言文字学的成就为核心和骨干，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考证等全面开花，硕果累累。它既是我国古代文献学的一个高水平的总结，也是现代古文献学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基点。这一时期的宝贵的古文献学遗产，尤其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借鉴。”^① 清代文献学包罗万象，成果辉煌，仅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也能形成皇皇巨著。本书就笔者兴趣所在及专业特长，选取清儒整理研究唐代文献这一问题，拟通过对有清一代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唐代文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初步梳理和总结，藉以管窥清代文献学的发展及成就。

在本书研究范围内，所谓“清儒”概指有清一代利用考据学方法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唐代文献”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唐人撰写的各类著作，二是指唐代以后民国以前历朝历代学者撰写或编纂的有关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文献。迄今为止，关于清儒整理研究唐代文献的成就，学术界一直乏人关注，更谈不上系统、全面的论述与研究。仅有的不成系统的相关成果散见于文献学史、史学史及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之中。首先，就文献学史的研究而言，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撰成的

^①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64页。

《中国文献学概要》可谓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初步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研究体系。此书第三章对文献学史上三次大型的古文献整理活动作了回顾和总结，其中乾隆年间审校《四库全书》是清代文献学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重在总结编纂《四库全书》时采择、著录、禁毁、笔削等情形，但未涉及具体文献，遑论唐代文献。之后，文献学著作层出不穷，而涉及文献学史，尤其是清代学者整理古文献成就者则仅有两种。其一是张舜徽的代表作《中国文献学》，此书第九编专门总结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作者分别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个方面对清代考证学家整理古代文献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其二是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此书第七章对清及近代古文献学发展的特点和分期、社会环境对古文献学的影响、当时古文献在各方面的成就及四部文献的整理情况、重要文献学家一一介绍。但由于受体例和内容的限制，两书均只涉及少量唐代文献。其次，本研究虽然属于文献学的范畴，但由于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学术史、史学史等学科都有关涉。学术史方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以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完成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四章叙述了清代学者整理古代文献的业绩及成就，此是第一次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清代学者整理古代文献的成就进行概括和总结，具有首创之功，其中亦涉及少量唐代文献。史学史方面，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七章对清人补缺新、旧两《唐书》的五种著作分别作了介绍。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专列《清代史学概观》一章，分别叙述了清代史学研究中整理及补作旧史的成绩，涉及清人对两《唐书》的考订、辑佚及校注。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重在叙述明清两代史学的发展成就，第六章涉及清人整理两《唐书》的若干成果。以上各家，对清人整理唐代文献关注较多的是两《唐书》的考补及校注，但多是简单的叙述，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鉴于上述涉及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著作寥寥，而清儒整理唐代文献又是清代文献学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此问题无疑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清代文献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此外，唐代文献作为研究唐史的基本资料，历来即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早在五代、两宋时期，学者们就开始进行整理与研究，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成果至今仍遗惠学界。清人学风朴实，考证精详，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唐代文献进行搜集、保存、整理和研

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果也同样是研究者可资利用的珍贵文献。因此，总结清代学者整理研究唐代文献的业绩和成就，有利于更好、更便捷地在唐史研究中利用这些文献，同时清代学者研究和利用唐代文献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清儒用考据家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盛世唐朝的历史，将目光定格在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对唐代文献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与研究，而这种整理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成果繁多而又缺乏系统性，限于篇幅，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因此本书主要着眼于清儒整理唐代文献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从五个方面对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进行总结概括。

一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汇集和整理传世文献的工程，唐代文献作为传世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这种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清人对唐代文献的著录、存目、辨伪、辑佚、校勘及价值的认识和评价等方面。因此本书在全面综述《四库全书》著录唐代四部文献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四库全书总目》的解读，进一步总结四库馆臣去取唐代文献的标准，以及其对唐代文献从辑佚、校勘、辨伪等方面的整理，和对唐代文献价值的认识。

二 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

两《唐书》作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在清代得到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首先从两《唐书》的刊校、笺注与订补三个方面来说，清代学者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乾隆四年（1739）刊校的两《唐书》武英殿刻本及道光年间所刊《旧唐书》惧盈斋刻本，为清人研究两《唐书》提供了方便易得的资料。笺注方面，沈炳震的《唐书合钞》及唐景崇的《唐书注》，为两《唐书》做了大量基础性的梳理和笺释工作。在补阙和考订方面，仅《二十五史补编》所收清人补作两《唐书》的表志就多达十四种，其中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劳经原《唐折冲府考》、罗振

玉《唐折冲府考补》和《唐折冲府考补拾遗》等成果影响甚大。其次，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考证史家代表了乾嘉史学的最高成就，三人在其考史名著《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两《唐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因此有必要就其对两《唐书》的校勘、编纂得失的认识以及对唐代史事、人物、典制的探究及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

三 唐代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学者普遍重视金石资料的搜集整理，并自觉地使之与文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宋代以来，唐代石刻碑志即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加之其在中国古代金石资料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清代学者在搜辑、汇编、著录唐代金石资料的同时，还利用金石文字考经证史，出现了《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等研究专著，还涌现了大量利用金石证史方法考补两《唐书》，研究唐代地理、寺院等问题以及考补《长安志》的成果。

四 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学者在整理和总结唐代文学文献方面的成就绝不亚于其对两《唐书》的整理和总结，一方面汇辑、编纂或选编唐人总集，一方面整理和笺注唐人别集，而在整理和笺注唐人别集的过程中，又呈现出集大成特征和史学化倾向。

五 徐松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徐松不仅是研究西北史地的专家，同时也堪称文献学家与唐史研究专家，他在汇辑唐代史料方面卓有建树，其《唐两京城坊考》和《登科记考》是研究唐代两京都城建置及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献，在清代唐史研究缺乏系统性专著的背景下，此两部著作可谓特立独行，体现了徐松非凡的学识和功力。而徐松最大的贡献则是对与唐代两京及科举制度有关的史料的钩稽排比，因此本章围绕《唐两京城坊考》及《登科记考》的正文及

注文，主要介绍了徐松利用钩稽排比方法在增补及排比唐代史料方面的成就。

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笔者力求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总结和叙述，凸显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业绩。在此基础上，客观地总结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特点及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总而言之，清儒整理研究唐代文献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不遗余力的史料建设和涉及广泛的唐史研究成果两个方面。同时，清儒整理唐代文献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在考据学影响下，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为一体，整理手段成熟多样，研究方法日趋科学，以札记、序跋、案语、信函等承载学术成果等。同时，在文献整理中还呈现出总结及集大成式的时代特征。同样，清儒整理唐代文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如学者少有专精、成果略有重复、研究缺乏系统，理论有待升华等。

总之，本书以清儒整理唐代文献为中心，重点突出成就较为显著的五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和总结，并从中归纳出若干时代特征。在史料的运用上，主要依据清代学者的考史著作、古籍整理成果、学术札记、文集笔记及序跋书信等，同时适当参考和借鉴了当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凡此都一一详注出处，不敢掠美。

目 录

序	贾二强(1)
前言	(1)
第一章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
第一节 《四库全书》著录唐代文献综述	(3)
一 经部	(4)
二 史部	(6)
三 子部	(10)
四 集部	(13)
第二节 《四库全书》著录唐代文献的去取标准	(16)
一 有见必录	(16)
二 有益于保存文献	(19)
三 有资于考证	(22)
第三节 四库馆臣对唐代文献的初步整理	(25)
一 辑佚	(25)
二 校勘	(30)
三 辨伪	(32)
四 删繁补阙	(35)
五 订谬正讹	(36)
第四节 四库馆臣对唐代文献的初步研究	(38)
一 论世知人	(39)
二 版本源流	(42)
三 撮其旨意	(43)
四 品评优劣	(44)

第二章 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上)	(47)
第一节 两《唐书》的刊校	(47)
一 武英殿本	(48)
二 《旧唐书》惧盈斋刻本	(49)
三 《旧唐书校勘记》	(50)
四 叶万《旧唐书》校本	(52)
五 岑建功《旧唐书逸文》	(53)
六 张道《旧唐书疑义》	(55)
第二节 两《唐书》的笺注	(56)
一 沈炳震《唐书合钞》	(56)
二 唐景崇《唐书注》	(60)
第三节 两《唐书》的订补	(62)
一 两《唐书》之补阙	(63)
二 两《唐书》之考订	(66)
第三章 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下)	(71)
第一节 钱大昕与两《唐书》	(72)
一 对两《唐书》的校勘	(73)
二 对两《唐书》编纂得失的认识	(75)
三 考证过程中的探幽发微	(80)
第二节 王鸣盛与两《唐书》	(84)
一 文字内容的校勘与比较	(85)
二 编纂得失的认识和思考	(89)
三 有关典章制度的考证与总结	(97)
四 有关史事、人物的考证与评价	(101)
五 对前人成果的评价和补充	(102)
六 考校过程中的疏漏与失误	(104)
第三节 赵翼与两《唐书》	(106)
一 史法	(107)
二 史事	(113)
三 理性超越与类比举证方法的运用	(117)

第四章 唐代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22)
第一节 金石学的复兴与繁荣	(123)
一 经久不息的金石热	(123)
二 著录宏富的金石文献	(127)
三 新史料意识的全面觉醒	(128)
第二节 唐代金石文献的著录与研究	(132)
一 清人研究唐代金石的专著	(132)
二 清代金石著作中的唐代碑石	(140)
第三节 金石证史与唐史的考补	(143)
一 金石证史方法的普遍运用	(143)
二 涉及广泛的考补唐史成果	(145)
第五章 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67)
第一节 唐人总集的汇辑与刊刻	(167)
一 《全唐诗》的汇辑	(168)
二 《全唐文》的编纂	(171)
三 其他唐代总集的选编与评注	(174)
第二节 唐人别集的整理与笺注	(178)
一 前无古人的别集笺注	(179)
二 以注杜为代表的别集笺注	(179)
三 一人之别集,数家之笺注	(182)
第三节 清儒笺注唐人别集的集大成特征	(184)
一 辑佚补遗,订谬正讹	(185)
二 广采博收,取长补短	(189)
三 汇集资料,求全责备	(193)
第四节 清儒笺注唐人别集的史学化倾向	(197)
一 作者年谱的改订或补作	(197)
二 诗文系年	(200)
三 诗史互证方法的普遍运用	(204)
第六章 徐松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207)
第一节 徐松其人	(207)

第二节 《唐两京城坊考》	(208)
一 正文组成	(208)
二 注文内容	(215)
三 成就及不足	(216)
第三节 《登科记考》	(221)
一 正文组成	(223)
二 注文内容	(225)
三 成就及不足	(229)
第四节 唐代史料的钩稽排比	(232)
第七章 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特点与局限	(239)
第一节 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	(239)
一 不遗余力的史料建设	(239)
二 涉及广泛的唐史研究成果	(240)
第二节 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特点	(241)
一 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时代特色	(241)
二 成熟多样的整理手段	(242)
三 嘉惠士林的研究方法	(247)
四 以札记、序跋、案语等承载学术成果的研究特色	(251)
第三节 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局限	(255)
一 学者少有专精	(256)
二 成果略有重复	(257)
三 研究缺乏系统	(258)
四 理论有待升华	(259)
附录 说“荷校”	
——兼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荷杖”之谬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82)

第一章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学术文化异常繁荣，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然自唐代灭亡至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已相去近八百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能够有幸逃过天灾人祸、兵燹浩劫而幸存下来的唐人著作已为数不多。另外，唐代以后至乾隆之前，历代学者也曾致力于唐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人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成果，但因历时久远，分散各处，不易寻检。有幸的是清代乾隆年间，清朝的统治进入全盛阶段，富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清王朝也非常注重利用传统的学术研究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加之乾隆皇帝熟谙中国传统儒学，以“稽古右文”相标榜，深知“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经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①的道理，以弘扬文治为最有效的治理手段。于是乾隆皇帝除发中秘之藏外，还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为保证图书征集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皇帝还制定了具体的采集办法和奖励措施。各地督抚大力搜讨，藏书家也纷纷呈献，在政府的运作和各地督抚的努力下，短短的几年时间，征集来的图书总数已达数万种，其中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保证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留存不多、分散难寻的唐代文献也因此汇集其中，使后人得以窥探唐代文献的概况。

^①（清）高宗弘历撰，梁国治等编：《御制文二集》卷一三《文渊阁记》，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汇总和整理传世文献的工程，共著录书籍 3461 种，存目书籍 6793 种，合计收书 10254 种。《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图书上自先秦典籍，下迄清初文献，可以说是一部囊括古代文献的巨型丛书。其中以明、清文献居多，唐代文献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初，乾隆皇帝即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对搜辑之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①。不久，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上书乾隆帝，提出了“著录校讎，当并重也”的主张及“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的建议。^②同时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纂修官要从大量内府藏本及征集而来的图书中选出入选书目以待乾隆帝定夺，也必须对所选之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对文献作者及内容作简要介绍。因此，《四库全书》著录或存目的每一部图书都附有内容提要。《四库全书》修成后，几经修改，又将这些提要汇集为《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六十年（1795）校勘完毕，刊刻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是了解中国古代典籍概况及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部重要目录书，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目录编纂的里程碑，而且阐明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学术文化史”^③。

《四库全书》著录或存目的每一部唐代文献也不例外，都有与之相应的一篇内容提要，这些提要既是清人对唐代文献内容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四库馆臣对唐代文献的认识。众所周知，编纂《四库全书》时，首先要对内府藏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坊刻本（即《提要》所说“通行本”）等图书文献进行审查，决定去取。去取的总原则在《凡例》中已有说明：

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歧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偏。左右佩剑，均未协中。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② 同上书，第 21 页。

③ 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引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